

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

杨 珍

权臣，本文是指封建王朝统治集团上层成员中拥有较大权势，以不同方式对皇帝的地位、权力或人身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并部分攫取、侵夺皇权之人。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具有多面性，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权臣并非从一开始就处于皇权的对立面，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权臣，是因为其所作所为都曾适合皇权发展的需要，并为此建立勋绩，其后恃功而骄，权力欲逐步膨胀，不断侵夺皇权，对皇权形成威胁。权臣的出现，是中国传统社会皇帝乾纲独断的专制政体下，无从避免的一种历史现象。权臣往往是统治阶层中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现出这一利益集团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这一利益集团与皇帝的关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确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建立绝对专权的皇帝制度后，据此制定实施的王朝内部权力分配规则，在明朝以前基本为历代所沿用。秦朝以降，历代王朝都曾出现权臣，但由于他们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同阶段的皇权之强弱，有很大差异，加以其他主客观因素，促使这些权臣对王朝的影响、作用颇不相同。就一个朝代而言，在其不同时期出现的权臣，共同构成这一朝代中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对这一政治群体进行综合研究，既可从一侧面，考察某位皇帝在位期间的有关史事，且能部分揭示整个王朝权力运作与权力分配的总体状况，以及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关系及其变化，进而有助于我们探索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政治演进的内在规律。

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基本相一致，中国皇权的演进变化可以宋代为断线，分做两个时期。秦、汉、隋、唐处于中国皇权发展进程的前期，即皇权确立与逐步成熟时期，历时约1130年（公元前221年~907年）。从统治阶层内部权力分配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皇帝的权力在逐步扩大集中，但其过程相对缓慢。宋、元、明、清时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后期，历时约950年（960~1911年）。宋朝皇帝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旗帜下，有效加强对官僚集团，特别是对武将的严密控制。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皇权进一步扩大、加强，官僚集团的总体地位进一步降低。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体，联合蒙、汉贵族而建立的

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确立天命汗权，这是清朝皇权的先期形态。天聪九年（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建立清朝，后金汗权完成向清朝皇权的转变。从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1683~1775年），皇权的高度集中、强化进程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为历代王朝所未有。在此期间，清朝皇权的强化程度达到中国皇权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在上述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清朝权臣，既兼有历代权臣的共性，也独具某些特性。这一政治群体的成员，包括以下7人，即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①

一、清朝权臣对皇权的维护与加强作用

中国皇权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后，即具有独占性与排它性的特点。清朝皇权的集中、强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述两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情况下，皇权仍然会有流失。自清初乃至咸丰时期，皇权流失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是出现不同类型的权臣。^②究其原因，从表面看，这是由于皇帝本人年幼、衰迈，或因王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情况所造成，实际上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皇权为维持其正常运作的需要使然。换言之，皇权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以及它本身的某些客观需要，成为皇权流失暨权臣出现的先决条件。

需要指出，处于清朝皇权衰微阶段后期的同、光、宣三朝，皇权的流失最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皇权与皇位的长期分离，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造成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这是皇权流失的一种特殊形式。清朝前期与中期，当皇权出现流失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能够通过种种具体措施，清除权臣，收回流失的权力，体现出皇权自身具有较强的调节、修复能力。然而晚清皇权已不具备这一能力，无法收回被列强所侵夺的权力，收复国家主权，甚至无法改变皇位与皇权长期分离的状况。

如果从不同时期皇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亦即清朝权臣之所以产生的客观条件看，清朝权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皇帝年幼之际，缺乏治国经验，或因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需要得力之人辅佐，方能维持皇权的正常运作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权臣，如鳌拜、索额图、明珠与

① 清朝权臣的具体事迹，参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本文从略

② 除去权臣外，后妃、外戚、内侍、强藩等干政。也会造成皇权的流失这种情况在清以前各代并非少见，清代直至咸丰朝以后，方出现太后专权。

和珅。

康熙帝继位时不满7周岁，不能独立行使皇权，因而实行辅政体制，由上三旗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4人辅政，“担当国事，裁决庶务，入白太后（孝庄），”^①

在皇太极去世后出现的清朝继统危机中，孝庄与两黄旗大臣联合，排除各种阻力，使顺治帝得以继位。多尔衮摄政期间，两黄旗大臣是孝庄用以保护幼帝顺治帝的安全，并与多尔衮称帝企图相抗衡的主要力量。顺治帝亲政后，两黄旗大臣依然是孝庄的心腹，忠实执行孝庄的意图，对顺治帝的集中、强化皇权诸措施起有较大牵制作用。^②四辅臣中，除去苏克萨哈外，索尼、遏必隆与鳌拜都是两黄旗老臣。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江南秀才周南谄条奏，请求太后垂帘，^③孝庄未予理睬。这其中除去满族没有太后垂帘的传统，以及孝庄的个人品性等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索尼等两黄旗老臣乃孝庄信任之人，能够代表她的意志。孝庄可以放心地让他们代行皇权，其本人在幕后指挥，不必垂帘听政。慈禧同肃顺等赞襄大臣之间的关系，则与此完全不同，将于本文第二节析述。

顺治帝去世时，中国大陆尚未统一，清廷内部各项建置尚不完备，又面临长期战乱后百废待兴局面，形势极为复杂艰巨。所以，必须由强有力的辅政者总揽政务，指挥全局，方能保证清廷庞大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四辅臣辅政时期，曾有若干明智之举，如重视满蒙联盟，恢复并提高理藩院的独立地位；革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一度取消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改用策论等等。但在涉及满权关系、文化政策等领域，却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方针。^④不过，总的来看，他们虽然有重大失误，但仍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在此期间（顺治十八年正月至康熙八年五月），清朝平稳渡过顺康交接之际最为困难阶段，逐步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实现大陆统一，为康熙帝亲政后清朝有一较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鳌拜（？~1669），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他在天聪八年（1634年）被授予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884页。

② 本文引证的材料中，凡未加小注者，分别出自杨珍下述论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索额图研究》（1996年《清史论丛》）、《康熙朝隆科多事迹初探》（1994年《清史论丛》）、《盛世初叶（1683~1712）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1999年《清史论丛》）、《明清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历程——以明内阁、清军机处为中心》（《中国史学》第9卷）。限于篇幅，未再注明，敬请鉴谅。

《清圣祖实录》卷2，顺治十八年三月甲子。

④ 参见杨珍：《中国史稿》第七册第二章第一节《康熙嗣位和亲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骑都尉世职、担任参领时年约25岁为计，应生于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左右，比康熙帝大约年长44岁。他是清朝权臣中与皇帝的年龄相差最大者。鳌拜历任三朝（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先后臣属于祖孙三代（皇太极、福临、玄烨）清帝，是清朝权臣中资格最老的一位。顺治年间，鳌拜先后任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

初任辅政时，鳌拜名列第4位，但因名列首位的索尼年迈（康熙六年去世），遏必隆缺乏主见，而惟一来自正白旗的苏克萨哈势单力薄，加之由于历史的积怨，素与两黄旗大臣索尼等不相和睦，在四辅臣中较为孤立。所以，在四辅臣共同“担当国事，裁决庶务”，亦即维护皇权正常运作的过程中，鳌拜逐步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康熙六年（1667年），14岁的康熙帝亲政，但尚缺乏历练，辅臣仍行辅理。所以，即使当鳌拜日益对皇权产生威胁后，他在保证皇权正常运作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虽然逐渐减弱，但仍然存在，并一直持续到辅政体制的终结。

康熙八年（1669年）清除鳌拜集团后，皇权大为集中。康熙帝在纠正四辅臣时期的失误，确立崇儒重道方针，改善满汉关系，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举措，并取得显著成效。不过，康熙帝毕竟还很年轻，缺乏治国经验，孝庄太皇太后虽然仍对孙儿予以支持、指导，但终究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康熙帝从一位少年天子，成长为治国有方的万乘之君，须有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康熙帝需要有比他更有经验的大臣作为助手，为之出谋划策，使他能够在治理国务的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一步步成熟起来。这在客观上为索额图、明珠两人逐步扮演权臣角色，提供了契机。

明珠（1635~1708），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比康熙帝年长19岁。索额图（1637? ~ 1703），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他比明珠小两岁，较康熙帝长17岁。^①当亲政未几的康熙帝尚是一位少年天子时，两黄旗大臣索额图与明珠正值盛年，且精明干练，有一定的政治阅历，是为康熙帝所倚用的合适人选。作为四辅臣中的元老索尼之子，索额图在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过程中立有首功。这是他成为权臣的一个重要政治资本，也因此而先于明珠，受到皇帝青睐。康熙朝前期，索明两人都曾先后担任大学士、议政大臣、内大臣等职。

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一月，朝鲜使者返回途中给国王的报告中，谈到他从一位郑姓汉人那里了解到的清朝平叛战争情况：“……南方若有捷报，则辄即印出颁示；至于败报，皇帝亲自开见，只与皇后父率哈（索额图）及兵部尚书（明珠）密议之，诸王诸大将亦或不得闻。但东华门夜不闭以通南报。且皇帝年少性急，近因丧患兵乱，心气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谕、满文奏折（两件档案均无具体年月）载，天聪九年（1635年）十二月蓝旗事件发生后，索额图的生母嫁给索额图之父索尼，之后被诛杀。因此，索额图大约生于崇德二年（1637年）或稍后。

暴发，不能自定；诸王诸将亦无智虑之人，吾辈不知死所。”^①所言未必完全符实，但间接反映出一些重要信息。当时，清朝面临的局势极为严峻。是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清，进而对清朝平叛战争形成极大牵制。加之前方将领“互相观望，迁延不进”，故康熙帝曾有亲征的打算。^②同年五月，康熙帝的皇后，索额图的侄孙女赫舍里氏因难产去世。年仅21岁的康熙帝在家事、国事皆遭挫折时，一度产生情绪波动，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下，索额图与明珠所为康熙帝的两位主要助手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历时八年（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的平叛战争，是清朝为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而不得不为之举，意义重大。索明两人在平叛战争中做出贡献，对清朝皇权已开始的高度集中与强化进程，也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

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为标志，清朝皇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康熙帝的治国经验日趋丰富，在皇权运作过程中他需要索明两人予以辅助的程度也在降低。其后，索额图和明珠分别受到康熙帝的惩治，逐步终止其权臣角色，与此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乾隆后期及太上皇时期的权臣和珅与康熙朝权臣鳌拜、索额图和明珠等人，相隔约一个世纪，但从其何以成为权臣的原因看，同鳌拜等不无相似处。

和珅（1750~1799），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和珅逐步受到皇帝的倚信，曾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职。

乾隆四十年，乾隆帝已65岁。此后的20余年中，尽管他的身体尚好，但年事日增，精力终有不逮，加之兴趣广泛，耽于奢华享受，各种娱乐活动甚多，因而需要一位既是心腹，又能干得力之人，协助他总揽朝纲，综理政务。由于已实行秘密建储，乾隆帝不能以其密定的储君颢琰（嘉庆帝）赞襄国政，所以，既有突出的才智，又善于巧言奉承，为人处事机警灵活的和珅，便成为合适人选。

可见，和珅之所以深受乾隆帝信赖而成为权臣，说到底还是由于皇权运作的特殊需要。在乾隆后期将近20年中，他作为皇帝的得力助手，也确为维护皇权正常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类，是为新帝获取皇位，或为新帝继位初期巩固皇权立有大功之人，如隆科多与年羹尧。同第一类权臣相仿，表面看，他们能够成为权臣乃有一定偶然性，实则仍是皇权在特定形势下自身发展的需要，为其提供了成为权臣的必要条件。在他们扮演权臣角色时期，也曾有效地促进皇权的集中、强化。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册，第3996页。

《清圣祖实录》卷51，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

隆科多 (? ~1728), 佟佳氏, 满洲镶黄旗人。^①康熙后期任步军统领, 是雍正帝继位初年的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根据满文档案等有关记载推测, 隆科多大约生于康熙九年 (1670年) 或康熙十年 (1671年), 比雍正帝 (生于康熙十七年) 年长七、八岁。

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已颇受器重, 但还算不上是一位权臣。他据以成为权臣的资本,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康熙帝突然病逝, 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获得皇位这一问题上, 隆科多起有关键性作用。二是雍正帝继位后, 有关其矫诏得位之说广泛流传, 他在满族贵族上层中一度十分孤立。隆科多作为他的亲信之一, 曾予以全力支持和佐助, 以促进皇权的稳固与强化。

关于隆科多在雍正帝继位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本文不予详述, 仅补充一点。

雍正元年 (1723年) 正月初二日, 川陕总督年羹尧上《会陈军务事情请先具稿密呈折》, 雍正帝在朱批中写道:

“再, 舅舅隆科多, 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 真正大错了, 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 朕之功臣, 国家良臣, 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②

这是隆科多在雍正帝继位问题上立有大功的一个佐证, 实际上也是雍正帝本人对于隆科多何以能够成为权臣所作出的诠释。此时距康熙帝去世, 尚不到两个月。隆科多惟有在胤禛继位问题上起有至要作用, 才会得到新帝如此之高的评价。

由于康熙帝晚年属意于皇十四子允禵, 他在朝廷有关重要部门的人事安排, 是从能否有利于允禵继位后得到其支持者的得力辅佐这一目的而出发。雍正帝继位后, 不得不暂且维持这一既定格局, 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在朝中组建一个真正忠于他本人的助手班人。^③直到雍正四年, 为准备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事宜, 户部“别立军需房”, 由怡亲王允祥及张廷玉、蒋廷锡等人主管。这标志着雍正帝身边已逐步形成全部由其亲信组成, 为其直接指挥, 完全受其控制的辅佐集团。然而雍正帝继位后最初一两年内,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朝中是为人数众多, 很具实力的反对派成员及其支持、同情者

① 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 (初名体盛年) 原隶属于汉军正蓝旗。康熙二十七年 (1688年; 一说康熙八年, 1669年) 佟图赖之子佟国纲、佟国维 (隆科多之父) 改隶满洲镶黄旗。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35,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甲辰; 《清高宗实录》卷81, 乾隆三年十一月乙亥。

《掌故丛编》, 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第254页。

康熙帝去世后翌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尚未即位的雍正帝命贝勒允禔、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理藩院) 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4人中允祥与隆科多是胤禛的支持者, 允禔为胤禛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马齐原为允禔的支持者, 一废太子事件后, 马齐逐步在储位之争中采取了中立态度。

所包围，处境可谓艰难。如果不计外任官员，清统治集团上层中受到雍正帝特别倚重者，除去怡亲王允祥外，惟有隆科多一人。

满文档案中的记载，或可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对于雍正帝来说，隆科多曾是不可或缺的心腹和助手。

雍正元年（1722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向全体朝臣宣布了秘密建储的决定，并将装有建储密旨的密封锦匣，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八月十八日，雍正帝启程赴遵化，“葬圣祖仁皇帝于景陵，孝恭皇后祔焉。”^①九月初三日雍正帝返京。此行往返共15日。^②这是雍正帝继位后第二次离京外出。^③

在此期间，留守京师的隆科多通过密折与雍正帝保持密切关系。如八月二十三日卯时，隆科多接到雍正帝发回的朱批谕旨及所附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青海事宜的密折。隆科多遂上密折奏称：“数日来京师内外太平无事，未闻有流言蜚语，粮价也尚平稳。”并详尽列出各类粮谷价格及银、钱兑换比价。雍正帝阅后在朱批中写道：“联躬甚安。四五个月来联心郁闷，虽为太后额娘事悲痛不已（按，雍正帝生母孝恭皇后乌雅氏于是年五月去世），但思念皇父，渴望恭谒梓宫之意未曾释怀。二十四日抵此，痛哭已尽，甚感畅快。丝毫不必为朕担忧，联又岂能由着性子作践身子？外面的事全都安顺。特降谕。”^④

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初六日，雍正帝起程赴遵化谒陵。初九日雍正帝接到年羹尧奏报，闻知青海大捷，十一日回銮，十三日抵京。此行往返共8天。^⑤这是他继位后第三次离京外出。

此次雍正帝外出期间隆科多所写密折，仅发现两件，根据内容看，均写于是年三月初九日之后至十三日雍正帝返京前。

一件密折中写道：“因闻得青海底定，大功告成，京城内喜气洋洋，人人欢汴（朱批：猜想理应如此），太平无事。诸王、大臣等跟随主子近前，不知如何欢快行走，臣实为羡慕（朱批：也应这样想）。本月初七日起修缮宫内流水孔道，初九日修讫。诸阿

《清史稿》卷9，《本纪》9，《世宗本纪》。

参见《雍正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册，第85~92页。按，《清圣祖实录》中的有关记载与此稍有出入。

③ 雍正帝继位后第一次离京，是元年（1723年）三月二十七日亲送康熙帝的灵柩至景陵，四月初六日回京。此行往返共10天。参见《清世宗实录》卷5，雍正元年三月丙午至四月乙卯。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无年月，根据该折内容并查阅有关史料，可判断该折写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二十三日或稍后。

《雍正起居注册》第1册，第189~194页。

哥在瀛台住了两日，初九日傍晚已回宫（朱批：甚好）。阿哥们身体甚健。又，臣等钦遵旨意，召年遐龄至乾清门宣旨，令伊恭阅朱批谕旨，并将年羹尧之喜报使其阅之。臣等亲视看视，将各式绸缎九十疋赏给。年遐龄至乾清门前叩谢天恩。年遐龄说，我等全家蒙主子隆恩甚重，何能回报。这并非我儿年羹尧小辈之所能，乃因恃圣主指教之恩，方成此大功。等语。……”雍正帝阅此折后朱批：“老来造化。除去高兴外，他还说了些什么？”^①

另一件密折写道：“圣主交付之朱笔谕旨，臣钦遵办理外，此次大功告成，实为主子之福，得上苍眷佑，乃奇异大喜之事！从此天下重获安定，无兵戈之患，可永享太平矣！大将军年羹尧奏报的折子，臣已读给诸阿哥听闻，并告知总管太监等。所有闻得之人无不大喜，欢欣鼓舞。……”雍正帝阅后朱批：“此喜信期盼已久。边疆之事告成后，（三月）十一日即回銮。现今所有事宜皆顺乎心意。联思念皇父，忧伤郁闷。此前虽无数次往寿皇殿行礼，仍无法排解。今至陵寝放声痛哭，十余月来忧郁之情大为缓解。朕躬甚佳。所有跟随前来之人无不平安。”^②这件密折的朱批，当写于雍正帝结束谒陵后即将抵京之际，即三月十一日后，十三日之前。

隆科多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即开始担任步军统领一职。每年康熙帝离京去热河举行木兰秋狝期间，隆科多留守京师，并随时向帝密报京城的一切情况。这些满文密折及其康熙帝的朱批，有较大一部分保存至今。隆科多在雍正朝的满文密折，保留下来的则很少。仅存的上述几件，反映出以下一些重要情况。

第一，虽然尚无档案或其他史料予以证实，但很可能当雍正元年三四月之间雍正帝第一次离京时，总理事务大臣之一、仍管步军统领事的隆科多即留守京师。换言之，雍正元年三月至二年三月雍正帝三次离京期间，隆科多都负有此任。这同他在康熙帝离京期间镇守京师的情形，大有不同。由于雍正帝消除反对派的举措基本尚未实施，后者在朝中还有大批支持与同情者，所以，当雍正帝离京后，隆科多所面临的形势，相当复杂、险恶，而他因之所受皇帝的倚信程度，也远远超出康熙朝后期。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公布的隆科多罪状中，有“皇上谒陵之日，（隆科多）妄奏诸王心变”一款，并被作为他的“欺罔”罪之一。^③这一奏言或许有夸大处，但也间接透露出当时朝中的紧张氛围。雍正帝本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继位后始终未敢较长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无年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无年月。

《清世宗实录》卷62，雍正五年十月丁亥。

时间远离京师，以致被迫停止木兰秋狝。^①

还应看到，上述雍正帝三次离京，第二次的时间相对最长，而且是在宣布秘密建储决定的翌日启程。已行秘密建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雍正帝免除后顾之忧，不过，留京诸王大臣，特别是以允禩等人为核心的反对派成员对此举措有何反应，是否会激起事端，皆未可知。因此，隆科多留守京师之任，更为重要而艰巨。

第二，隆科多当时并未担任内务府总管一职，然而从其密折看，宫中事务，包括宫阙设施的修缮以及皇子们居住地点的转换，无不由他一手安排。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未来的接班人，刚刚被密定为储君的皇四子弘历，也在暂住瀛台的诸阿哥之列，其人身安全，自然是由隆科多全权负责。可以想见，隆科多若非得到雍正帝极大信赖，当无可能膺此重任。

第三，雍正帝将年羹尧关于西北用兵事宜的密折，转发隆科多看阅，让他将年羹尧奏报青海大捷的折子为皇子们宣读，并告知总管太监，又召年羹尧父年遐龄至乾清门宣旨阅折。这一切都表明，雍正帝外出时，不仅将家中事务托付隆科多综理，而且在他看来，后者应及时了解青海战事等核心机密。

雍正元年底，在年羹尧奏片中写有清军“进剿（罗卜藏丹津）”启行日期处，雍正帝朱批：“妙不可言。怡（亲王允祥）、佟（指隆科多）之外，不曾宣露一人。”^②允祥与隆科多深受雍正帝倚信，分别超出宗室成员或朝臣中的其他人。不过，允祥毕竟是皇族，且是皇帝之亲弟，虽然很有才干，但从接触人员之广泛，办理宫内外各种事务所具有的丰富经验以及更便于上下沟通等方面看，隆科多所起的作用，是允祥所无法替代的。

年羹尧（？~1725），汉军镶黄旗人。^③他大约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比雍正帝小两岁。^④

① 雍正帝说：“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盖以联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结匪党，僭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联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参见《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初二日。

② 季永海等：《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③ 按，官修史籍中皆如是说。但年羹尧是雍正帝的“藩邸旧人”，而雍正帝继位前与其他皇子一样，被封入下五旗，绝无可能领有两黄旗。《永宪录》载：“羹尧字亮工，奉天镶白旗人。”年羹尧很可能原隶属于汉军镶白旗，在雍正帝继位后方转入汉军镶黄旗。另据杜家骥先生考证，雍正帝做皇子时封于镶白旗，年羹尧则是康熙四十八年拨与胤禛的镶白旗汉军佐领下人，直至康熙帝去世前，年家仍在镶白旗。参见萧爽：《永宪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页；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据萧爽《永宪录》，第54页载，（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抚川时，年未三十”。

康熙晚期，年羹尧即因办事明敏而为康熙帝所欣赏。他长期担任西南封疆大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率军配合大将军王允禵，驱除准噶尔兵，收复拉萨，翌年升任川陕总督。雍正帝继位后，允禵从军前被召回，曾为雍邸私人的年羹尧总领西北军政大权，威信、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权臣。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在他的指挥下，清军迅速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的叛乱，这一重大功绩将他十分短暂的权臣生涯，进一步推向高峰。

关于年羹尧平定青海的经过，本文从略，仅就此举何以有效地促进皇权的稳固、集中与强化，并使年羹尧获得成为权臣的政治资本，做以下阐述。

第一，雍正帝继位后，其皇位之所以能够较快得以稳固，除去康熙前期即已出现的皇权不断集中、强化趋势，仍在继续发展这一重要历史背景外，主要得利于雍正初年的两项重大举措。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公开实行秘密建储，从根本上杜绝允禵、允禩等人染指皇位的企图，这对于分化、瓦解反对派具有重大意义。此其一。雍正二年二月，清朝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这一重要胜利大大提高了雍正帝在朝内外的威信，巩固了他的地位。此其二。

上述两大史事，也成为雍正帝清除反对派进程中的两次转折点。元年十月，他第一次在朝臣面前指责允禩，从继位初始采取各种笼络之举，到转而向反对派发动攻势。二年七月，他向全体大臣颁布《御制朋党论》，这是其打击反对派之举逐步升级的标志。^①反言之，如果罗布藏丹津叛乱不能迅即被平定，雍正帝的反对派将以此作为攻击、诋毁雍正帝的又一有力口实，雍正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威信将进一步受到贬损，而其清除反对派的进程，则将因之而延缓。

第二，年羹尧久任川陕地区封疆大臣，在处理与青海、西藏等地上层统治集团的关系，有效治理西北、西南地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他在奏报中所反映的情况以及诸多建议，对于康雍两帝制定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方针、策略有较大影响。^②特别是他在青海平定后提出“防边事宜”八款、“青海善后十三事”等建议，均为雍正帝所采纳，这些措施对清朝其后有效地治理青海、西藏产生了积极作用。

总之，青海大捷对于雍正帝清除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集中、强化权力，以及巩固边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年羹尧因此得到的

① 关于雍正帝清除反对派的情况，参见杨珍：《清代全史》第4卷，第17~2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参见邓锐龄：《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

褒奖，如同隆科多一样，一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①

年羹尧和隆科多获罪后，雍正帝数次谈到这是由于他对二人“敢于欺罔，忍于背负”的行为“辨之不早”，“宠之太过”，且“误加信任于初，又不曾严行禁止于继”，“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②事实上，正是由于在雍正帝侥幸取得皇位，进而肃清反对派，巩固皇权的过程中，隆科多与年羹尧分别立有大功，才会使刻薄寡恩的雍正帝对他们“宠之太过”。清帝中惟有雍正将当朝权臣出现的原因，主动揽在自己身上，这从反面进一步证实，年、隆两人确曾为雍正皇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类是晚清时期的权臣，仅有一人，即肃顺。

肃顺（1815？~1861），镶蓝旗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6子。他比咸丰帝年长大约15岁，自咸丰六年（1856年）后日益为帝赏识，“独见倚用”，^③先后担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等职。

在特定形势下皇权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为肃顺扮演权臣角色提供了可能性。肃顺所处时期的中国与清朝皇权，已发生重大变化，与其他清朝权臣相比，这位晚清权臣之所以出现的具体原因，他对皇权所起的维护作用，均有其独特处。

从嘉庆朝起，清朝进入中衰阶段。不过，尽管如此，皇权的集中、强化尚未受到本质性的破坏，皇帝仍然乾纲独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清帝进行决策时所具有的独断性和随意性，不断减少，除去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封建统治秩序外，按照条约的有关条例，清帝还必须顾及列强的意图，维护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清朝皇权由此进入衰微阶段。

才具平庸的咸丰帝在位期间，始终面临严重“内患”，即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虽然咸丰中期后，由于太平天国内江及湘军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清军在与天平军作战中的不利局势有所改变，但直到咸丰帝去世，太平天国对清廷的极大威胁并未消除。

① 例如，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雍正帝在年羹尧的谢恩折上写道：“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具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拘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言虽粗鄙失礼，尔等不敢听受，但联实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是年五月又在年羹尧的请安折上朱批：“你们此队大臣，联如何仁悯，施恩之处，联实无主意。嘉奖之字，皆不相称。以惟天地明鉴，增寿与你们，永为太平之柱，子孙繁盛。此乃联诚心为你们祝福，上苍定明鉴之。”参见季永海等：《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77、130页。

《清世宗实录》卷32，雍正三年五月己未；卷62，雍正五年十月丁亥。另参见萧奭：《永宪录》第190页。

《清史稿》卷387，《列传》174，《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丧失之多，割让领土之广，都大大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清王朝与咸丰帝在中国民众面前丢尽颜面，清朝皇权遭到沉重打击。

1861年5月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孙（Robertson）在给印度事务部官员阿斯登（Alston）的信中写道，咸丰帝是“一个当国家危急时机，不顾国政的人物”，是“毫无精力的皇族代表”。中国百姓“对于他们皇帝之懦弱无力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谈到他就表示鄙视”。^①这些评论有一定片面性，但也多少反映出咸丰帝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咸丰帝继位后，作为其主要辅佐班子的军机处与内阁的主要组成人员，几经变更。以军机处为例，咸丰元年至七年（1851~1857），出任首枢者先后有5人，其间经过5次变更（祁寯藻曾两次担任首枢）。^②以才智而论，这5人中只有恭亲王奕訢和满族大臣文庆较为出色。可是，曾是皇位有力竞争者的奕訢素为其胞兄咸丰帝所猜忌，担任该职不足两年即被罢免。文庆任首枢不足一载旋即病逝。接替文庆的汉臣彭蕴章连任首枢将近4年（咸丰七年至十年六月），任期相对最长。不过，这位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就任军机章京的老臣处事谨慎而能力不足，况且他任首枢时年过六旬，已入暮年。此外，担任御前大臣的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虽为咸丰帝所信赖，而且均为道光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但“二王实皆昏愤无能”。^③处于内忧外患夹击之下的咸丰帝，迫切需要一位对他忠诚且有决断之人作为心腹与辅佐，而肃顺恰是合适人选。

肃顺的阅历、才干和见识，在当时的满族贵族中相当突出。他“敢任事”，“治事严刻”，^④这种性格作风为大多数尸位素餐，只知自保的统治集团上层成员所缺少，也正是“厌廷臣习于因循”，力行整顿却又“乏匡济之略”的咸丰帝所欣赏和需要的。

肃顺是远房宗室，并无可能染指皇位，即使颇有权势，在咸丰帝看来也无从像奕訢那样对他构成威胁。

上述主客观因素的互相作用，共同造就了清朝最后一位权臣，同时也使肃顺成为咸丰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与利益冲突的聚焦点。

咸同年间，八旗与绿营的作战力已十分低下。清廷主要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所统率的地方武装，于同治三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些为维护清朝统治立下大功的汉臣，被旧史家称为“中兴之臣”。然而很长一段时期内，咸丰帝对曾国藩等人并不信任，在待遇、任职等方面加以限制，这既暴露出满族最高统治

严中平：《1861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续），《历史教学》1952年5月号。

参见《清史稿》卷177，《表》17，《军机大臣年表》2。

薛福成：《庸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清史稿》卷387，列传172，《宗室肃顺》。

者对于汉臣惯有的防忌心理，也说明咸丰帝十分担心其功高震主，对他的统治形成威胁。不仅咸丰帝对于应否放手使用曾国藩等心存疑虑，甚至连汉族军机大臣祁寯藻、彭蕴章等，也在这一关系到清朝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阻挠对曾国藩等人的重用。

与清朝最高统治层中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左，肃顺则对曾国藩等“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咸丰十年（1660年），“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①曾国藩在肃顺的保荐下出任两江总督，并授与钦差大臣统领江南事务后，方真正拥有包括筹集军饷在内处理军务的全权。^②

又如左宗棠曾被人“控之都察院”，既而又遭湖广总督官文“严劾”，“廷旨敕下文恭（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得知后，多方设法救护。咸丰帝曾询问肃顺：“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奏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咸丰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官公知朝廷欲用文襄（左宗棠），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不久，曾国藩“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③所以，人们认为“曾国藩、胡林翼之得握兵柄”，“皆肃顺主之”。^④

当肃顺深受咸丰帝信任之际，在他的劝说和影响下，咸丰帝终于较大程度地抛开原有成见，打消顾虑，重用曾国藩等人，以湘、淮军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主力。^⑤这一以汉制汉策略的提出和实施，成为咸、同时期国内战争中清廷由败而胜的转折点，有效地延缓了清朝衰亡之势。《清史稿》的修纂者称肃顺“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之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⑥这一评价较为客观。权臣肃顺对维护、巩固皇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于此。

史载。肃顺“独不喜满人，常谓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故

① 薛福成：《庸 龢笔记》，第14~15页。

② 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册，第199页。

③ 薛福成：《庸 龢笔记》，第15页。

④ 黄濬：《花随人圣 龢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清史稿》卷387，《列传》174，《宗室肃顺》；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册，第245页。

⑥ 《清史稿》卷387，《列传》174，《论》。

其待满人不如其待汉人之厚，满人深恶之。”“汉人有才学者，（肃顺）必罗而致之，或为羽翼，或为心腹……”^①晚清时期，满族上层对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汉臣中的能吏怀有好感者，不止肃顺一人。如咸丰前期担任首枢的文庆即“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②可是，肃顺不仅在力劝咸丰帝重用曾国藩等人方面，起有他人无从替代的作用，且身为宗室，却对满人厌恶至极，看法十分偏激。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十分复杂。它表明以文庆、肃顺为代表的少数满族贵族，在力图阻止清廷衰微之势方面，具有一定远见。至于祁寯藻、彭蕴章等汉族大臣，竟也反对重用曾国藩等人，则反映出清朝入关两个多世纪后，首崇满洲的观念已为汉官所接受，他们不自觉的站在与满族统治者相同的立场，看待曾国藩等人，对之抱以不信任态度。自然，与满族贵族相比，嫉贤妒能的心态在这些汉官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肃顺曾锐意整顿吏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亦因“治事之猛，识别之精，不避权贵，尤不顾八旗贵胄，故宗室旗人，恨之尤甚”。^③咸丰八年（1658年），原任大学士、宗室耆英在与英法联军的代表谈判期间擅自回京，被交与刑部严讯，拟绞监候，但肃顺独自奏请正法，咸丰帝令耆英自尽。是年发生顺天府科场案，在肃顺的坚持下，咸丰帝处斩主考官、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葭。”^④柏葭，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素持正，自登枢府，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不协。”^⑤咸丰九年又有宝钞案，肃顺因查出宝钞处所列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严行究治，大批官员、商人受到惩处，或被革职，或被籍没家产。大学士祁寯藻、翁心存皆因与肃顺意见不合，为避祸端激流勇退，“心存且几被重罪”。^⑥显然，肃顺整顿吏治过程中，带有排除异己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上述几件大案的打击面，括及满族宗室、蒙古八旗贵族及汉族高官，使本已相当涣散的清廷最高领导层更加四分五裂，动摇了作为清朝统治根基的满蒙汉贵族联盟。其后的历史证明，咸丰后期，在皇帝的支持下主要由肃顺所实施的吏治整顿，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由于扩大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削弱皇权，因而加重了王朝的衰微之势。肃顺自以为上述举措是在加强皇权，维护清朝统治，从实际效果看却起到相反作用，同时也使他

黄潜：《花随人圣 龢摭忆》，第497页。

《清史稿》卷386，《列传》173，《论》。

③ 黄浚：《花随人圣 龢摭忆》第429页。

《清史稿》卷20，《本纪》20，《文宗本纪》；《清朝野史大观》卷4，《清朝史料·咸丰八年科场案》。

⑤ 《清史稿》卷389 《列传》176，《宗室肃顺》。另参见《清史列传》，卷40，《大臣传统编》5，《柏葭》。

⑥ 《清史稿》卷387 《列传》174，《宗室肃顺》。

本人在统治集团中日益孤立，为其最终身首两处埋下隐患。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皇权的重大变化与诡谲莫测的政治舞台，赋予清朝的最后一位权臣更多的悲剧色彩。这是肃顺与清朝其他权臣很不相同处。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命奕訢留在京师，与英法联军谈判和约问题。十一年七月，咸丰帝于热河病逝。

咸丰帝临终前，传位年仅6岁的独子载淳，即同治帝。咸丰帝鉴于顺治帝幼年受制于多尔衮的教训，加之对奕訢不能消除疑忌，遂遗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8人“赞襄一切政务”，共同辅佐同治帝，^①奕訢被排除在赞襄大臣之外。同时，参照康熙初年的辅政体制，即辅政大臣处理军国大事，“载决庶务，入白太后”^②的成例，咸丰帝将两枚印章分别赐与皇后钮祜禄氏（慈安皇太后）和载淳，“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③

赞襄政务期间，所有大臣奏疏及军国大事，都要经过赞襄大臣审阅详议后，拿出处理方案，上报两太后批准。当8位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因对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事发生分歧后，他们以“搁车”（停理政务）相威胁，迫使两宫太后暂时做出让步，对董的奏折予以严驳。^④可见，八大臣名正言顺地拥有代行皇权的权力，而排名第4位的肃顺实际上是其核心人物，他对于在此特殊情况下维持皇权的正常运作，起有更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7位权臣虽然属于三种不同类型，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权臣，皆与其所处那一特定时期中皇权自身运作与发展的需要，有着因果关系，他们各以不同方式，辅助清帝维护、加强皇权，推动了清朝皇权的发展进程。

二、清朝皇权不同发展阶段中权臣的权力及其对皇权的反作用

首先需要指出，这里所探讨的权臣的权力，并非是其任职范围内拥有的常规性权力，而特指超出其职权范围的权力，以及不符合其臣子身份的所谓僭越之处。这种权力与行为，实质上是对皇权的部分侵夺。

清朝皇权总计276年（1636~1911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做三个大的阶段。第一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辑，第83页。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第3884页。

③ 佚名：《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总第36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3页。

④ 佚名：《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总第36号，第5页。

阶段是崇德元年皇权建立至康熙八年（1636~1669年）清除鳌拜集团以前，是皇权集中、强化程度相对较低时期；第二阶段是康熙八年清除鳌拜集团后至道光中期（1669~1842年），清朝皇权经历了一个高度集中、强化的历史进程。这一阶段又可分为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前期（康熙八年至康熙二十二年），逐步臻于极致的中期（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四十年）与开始下滑的后期（乾隆四十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第三阶段是道光中期直至宣统三年（1842~1911年）清朝灭亡，这是皇权衰微阶段。这一阶段可分做两个时期，即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十一年是衰微阶段的前期，同、光、宣三朝是衰微阶段的后期。

由于7位权臣分别处于清朝皇权发展历程中的不同阶段，这使他们的权力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按照其权力的大小以及侵夺、削弱皇权的程度排列，7人可以分做4个档次。

鳌拜独列第一档次。他是7位权臣中惟一一位在清朝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进程开始之前，出现的权臣。

顺治帝亲政期间，虽然采取诸多措施，力图集中皇权，但因与孝庄之间由于政见分歧引发矛盾与权力之争，加以当时大陆尚未统一，战事频仍，满族贵族传统的分权意识仍有较大影响等诸多原因，所以直至顺治帝英年早逝，康熙帝八龄继位时，皇权的集中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康熙初年的皇权，原本先天不足，而皇帝本人又在幼年，太皇太后孝庄居于幕后，并非直接干预政事，这一切为鳌拜逐步扮演权臣的角色，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使他较少受到皇权的约束与限制。

鳌拜的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蔑视皇帝，专横跋扈

鳌拜的很多行为举止，完全逾越君臣之间的界线，折射出一种无形的巨大权势。例如，他在康熙帝前办事，“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康熙帝引见官员时，鳌拜“施威震众”，对被引见的官员“高声喝问”。这不仅直接有损皇帝的威严，也使少年天子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即使在平日，鳌拜也常常对康熙帝的旨令随意加以拒绝。直到清除鳌拜集团37年后（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帝在与大臣的谈话中，还曾转述他对辅臣苏克萨哈讲过的话：“鳌拜并未将朕放在眼中。”^①

第二，把持朝政，独断而行

鳌拜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于康熙帝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凡事不依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勒依允”。会议苏克萨哈罪状时，鳌拜只同其亲信班布尔善等定议，将不附于己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折件，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的大学士巴泰排除在外，“不使与闻”。^①他甚至干预康熙帝的婚事，“敢行奏阻”孝庄做出的立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为皇后的决定。因“恐摘发情弊”，他屡请禁止科道陈言，对应诏条陈时政得失的熊赐履“意图倾害。”^②

第三，部分掌握生杀大权

鳌拜任辅臣不久，即借故枉杀与之有隙的内大臣飞（费）扬古及其子、侍卫倭赫等人“籍其家”。^③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鳌拜在索尼、遏必隆的支持下，不顾康熙帝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尚书事务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等人处死。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逝，七月康熙帝亲政，但众辅臣“仍行佐理”。^④苏克萨哈因“身体有病，不能行走”，奏请往守顺治帝陵寝，意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鳌拜为铲除异己，遂罗织罪名，拟将苏克萨哈置于死地，以独掌辅政权力。他“连续七天强奏”，康熙帝“全力拒辞，仍无法说服”。最后，鳌拜“携来将苏克萨哈等人议罪之奏本”，于康熙帝面前宣读，逼迫康熙帝批允。当逐个圈画奏本上将被处死的众多人名时，康熙帝“曾想宽赦数人”，但遭到鳌拜的反对。于是，苏克萨哈被处绞，诛灭子孙，该案所牵连的诸多人一并被枉杀。^⑤

至此，鳌拜的权力及其欺君擅权行为，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甫行亲政的康熙帝竟成为他控制于手中，用以实现其个人意志的工具。孝庄在此事中的态度，反映出诸多问题，本文不拟论述，但起码表明此时孝庄已不能约束鳌拜的权力，对于他的僭越行为只有保持沉默。

第四，部分掌握人事大权

辅政后期，鳌拜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朝廷的人事任免与奖惩权力，“所喜者举荐，所恶者陷害”，大力培植私党，对不附己者严厉打击。例如，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月，亲政后的康熙帝本已授马希纳为户部尚书，但鳌拜以该缺满员应设二人为由，将其亲信马尔赛“徇情补用”。康熙七月六月，鳌拜将康熙帝素不了解的济世，“强行推补”为工部尚书。由于户部尚书王弘祚“领部久”，对马尔赛专擅部务构成妨碍，是年八月被鳌拜免职。马尔赛去世后，“部臣请谥，上不允”，鳌拜竟擅自予谥忠敏。^⑥这些事

《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八年五月庚申。

《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八年五月庚申。

《满汉名臣传》卷5，《鳌拜列传》。

《清圣祖实录》卷23，康熙六年七月乙巳。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折件，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⑥ 《清圣祖实录》卷29，康熙八年五月庚申、丙午；《清史稿》卷249，《列传》36，《鳌拜》；《清史列传》卷6，《大臣画一传档正编》3，《鳌拜》。